

人口就业风险的化解

——温州经验解读

王尚银

(温州大学 法政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 在就业问题成为我国严峻的社会问题的时候, 温州的就业并没有成为社会难题, “温州模式”下的就业机制较好地解决了温州的就业问题。其主要原因是, 温州“八方呼应”的就业机制不断提高了动态就业能力, 有力地化解着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风险。

关键词: 温州模式; 就业机制; 人口就业风险; “八方呼应”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07) 02-0050-05

Employment Risk Solu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recent experience in Wenzhou

WANG Shang_yi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325035)

Abstract: As employment problems in China have come to be more and more national and serious and have nearly become a big headache for many local governments, it has, however, not been too much bothering to the Wenzhou government. To relieve the unemployed laborers, the Wenzhou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ed a flexibility mechanism—a typical Wenzhou Pattern, called Rapid Response System for Diversified Employment (in Chinese, called “Bafanghuying”), through which the unemployed laborers may receive aid and help from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in which self-employment is highly encouraged. Such a mechanism has helped to develop laborer’s employability skills and traits.

Keywords: Wenzhou Pattern; employment mechanism; employment risk; Rapid Response System for Diversified Employment

就业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化解人口就业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然而, 在这巨大的就业压力下, 温州却不存在严重的就业问题。因而分析温州就业机制的形成及其作用, 对于探索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人口就业风险的化解: “温州模式”下就业问题的解决

一般来说, 劳动适龄人口总量总是大于实际就业人口量, 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使然。不过, 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大于实际就业人口量有一定的限度, 即需要就业的劳动适龄人口总量稍大于已就业人口加满足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者数量。当需要就业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动在这个限

收稿日期: 2006-08-17

作者简介: 王尚银 (1956-), 男, 贵州贵阳人,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度内时,人口就业变动处于安全区;而当超过这个限度时,则进入了风险区。

温州是浙江省人口密集的地区,人口基数大,所面临的人口就业压力也大。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温州人口增长同全国一样,经过了两个增长高峰期,即1950~1958年、1960~1978年。在第一个高峰期,年均人口出生率为32‰,年均出生人口9.79万人;在第二个高峰期,年均人口出生率为31.4‰,年均出生人口14.05万人¹。这两个时期增长人口的集中就业期分别为1970~1988年和1982~2008年(20~30岁人口)。也就是说,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温州要为迅速扩大的劳动适龄人口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快,实际上,温州自1970年代起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就业问题。从以下简单的算术推算中,就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

对第一个集中就业期来说,如果以1952~1970年就业增长年均2.7万个就业岗位的速度测算,那么,1970~1988年新增就业岗位为51.3万个,1988年时,能够容纳的就业总量为:177.11(1970年的就业数)+51.3=228.41万人。而另一面,以年均20%的人口增长率计算,第一个集中就业期年均增长需就业的劳动适龄人口为7.5万。1988年时,要提供的就业岗位为279.61万个(减去了自然离岗约40万个),就业岗位差为51.2万个;对第二个集中就业期来说,假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未有大的改变,还以年均增长2.7万个就业岗位的速度测算,那么,2005年时,要提供的就业岗位为385.91万个(减去了自然离岗约48万),就业岗位差为144万个。

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地方社会,就业岗位缺口如此之大,说明温州需要就业的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已经大大超过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数,潜藏着巨大的人口就业风险!

如何面对这一社会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温州人用“温州模式”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闯过了就业难关,并将成功地走出人口就业高峰区。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就业增长速度很快。从1978~2005年,温州新增就业总量264.04万,年均增加就业岗位9.43万个。而在之前的1952~1978年,年均增加就业岗位是2.66万个。

本来,按照前面的测算,在第一个集中就业期,温州的就业岗位差为51.2万,1988年时能够容纳的就业总量为228.41万。而实际就业的统计数是340.37万,即19年来温州新提供的就业总量是163.26万。这一数字不但超过51.2万,还溢出112.06万;在第二个集中就业期,温州的就业岗位差为144万。2005年时能够容纳的就业总量为241.91万。而实际就业的统计数是464.75万,即24年来温州新提供的就业总量是225.18万。这一数字不但超过144万。还溢出81.18万^④。

由于创造的就业岗位量充足,温州的失业率一直以来都低于全国水平。从1996年到2005年,温州城镇登记失业率大都处在1.4%~3.7%之间,近几年还有下降趋势:2002年为3.7%,2003到2005年分别为3.1%、2.7%、2.3%。人口就业参与率高出全国约19个百分点。

以上阐述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几年,温州在只有浙江省4%的国家投资、10%的土地资源的条件下,成功地解决了占全省17%人口的生活、生产问题,即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解决了大量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问题,巨大的人口就业风险被化解于无形之中。

二、温州就业机制的形成及其对就业的贡献

(一) 温州特色的就业机制的形成

为什么在温州这样一个“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国家投入少、可利用资源少和交通条件差)的地方,能够顺利地解决就业问题,化解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是“温州模式”的作用。

那么,“温州模式”又是怎样解决就业问题的呢?据我们的分析考察,是温州“八方呼应”

¹ 温州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编,温州市人口发展概况(内部资料)。

^④ 本文数据除了有注明的外,均来源于温州市统计局,温州统计年鉴[M](1982~2005)。

就业机制。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是温州“八方呼应”就业机制的初创阶段。其主要内容是家庭工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是“八方呼应”就业机制的形成阶段。由多个投资主体共同投资经营的所谓股份合作制企业，成了温州民营企业的最典型的组织形式；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由于获得了宽松的体制环境，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民营工业迅速扩大，经济总量得到极大扩张，为就业增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劳动密集型产业、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展了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输出”、就业观念的改变为主要内容的“八方呼应”的就业机制最终形成和发展。

（二）“八方呼应”的就业机制及其对就业的贡献

此处的“八方呼应”是说，决定和影响温州就业的主要是下述八个方面，且这八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协同发展，共同对温州就业问题的解决发挥作用。这八个方面组成了一个大系统，系统的协同发展既维护、发挥了八个要素的自身发展，也产生了系统的整体功能，使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形成动态适应、良性发展。

1. 多种所有制经济

1978 年时，温州的所有制结构还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占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不到 1/10。改革开放后，这一状态开始打破，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快速上升，到现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改革初期的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状态：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以工业总产值结构为例，1980 年温州工业总产值结构比例为：国有经济 32.7%，集体经济 53.8%，其他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包括私人控股的股份公司）13.5%。2005 年这一结构比例变为：3.3%、0.6% 和 96%。目前，温州的所有制结构已形成多元化格局。

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改变了就业结构，拓宽了就业渠道，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1986 年在城镇私营个体经济从业的人数还只有 2.97 万人，而到了 2004 年，就达到了 56.33 万人。全市 2004 年有就业岗位存量约 450 万人，而个私经济就业岗位存量达 370 万人，占社会总就业存量 82%。可见，个私经济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新增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2. 劳动密集型产业

温州的绝大多数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作为温州支柱产业的服装、制鞋、塑料编织、打火机、低压电器等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投入资本少、技术精度要求不高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的优势，这对白手起家搞工业化的温州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性决定了经济增长和扩张要靠增加大量的劳动力来实现。因而，温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就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以第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1990 年温州工业（不包括建筑、交通）就业总量是 75.16 万人，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总量占 70% 以上。2000 年，相应的比例有了大幅度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总量占 80% 以上¹。

3. 城镇化的推进

由于家庭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温州的城乡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温州的城镇化也得以迅速展开。特别是小城镇的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均属罕见。

1978~1992 年是温州小城镇发展的初始阶段。全市建制镇由原来的 18 个发展到 134 个。到 2000 年，在全市 130 个建制镇中，共有 86 个镇的工业总产值超亿元，有 42 个乡镇超过 10 亿元，少数镇达到 80 亿元以上。

¹ 温州市人口普查办公室，温州市人口发展概况，内部资料。

温州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容量的重要途径。1980年，在城镇就业的人员还只占全部就业总量的17.38%，到2004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01%，增加了12.63个百分点。小城镇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器。

4.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温州从改革以来，就形成了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的流转态势。温州的这一流转过程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农民通过私人投资兴办工业，脱离农业劳动，落户城镇；二是进城经商，从事第三产业；三是进城务工，成为城镇的劳动生力军（农民工）。

由于工业化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城镇化大大拓展了劳动者的活动空间，所以，温州农民的分化不但规模大，而且速度快。从分化的规模上看，1978年，温州农村约有20多万人从事“副业”劳动，从事农业劳动的约有125万人。如果把这125万人作为第一产业能够容纳劳动力的界线的话，那么，到2005年，温州就有257.34万（382.34~125）农村劳动力分化到第二、三产业，平均每年要分化出9.19万非农劳动力。

5. 发展了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对温州的就业起了重要作用。从80年代开始，大量民工进入温州务工经商，诱发了温州职业介绍的发展。为了促成劳动力流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温州建立了各种职业介绍所，开展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就业指导等在内的就业服务。全市2004年有315家职业介绍所办理求职登记103.82万人，介绍成功56.41万人次，成功率54%。市职业介绍中心和市技术工人交流中心是温州两个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温州市职业介绍中心办理求职登记49.82万人次，介绍成功21.25万人次，分别增长28%和24%；温州市技术工人交流中心推荐就业累计近10.17万人，推荐成功7.38万人，成功率达72.6%。

6. 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温州于1991年在全国率先实施企业职工一体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后，基本养老保险的实施范围扩大到乡镇、街道、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过1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温州基本建立了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城镇企业、机关事业和农村社会保险一体化的管理模式，绝大部分已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均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据统计，至2005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在职职工94.76万人；参加工伤保险45.34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52.57万人^[1]。

温州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了“安全网”、“减震器”的作用，基本解决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为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高效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了就业的增长。

7. 劳动力“输出”——外出经商

温州模式的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经济，它要求打破空间的局限性，实行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改革开放后，温州农村劳动力外出人数逐年增加，到1993年已达到52.86万人。比较分析发现，温州外出劳动力具有所占比例大、流程远、向省外输出为主的特点。人们常说，温州“百万大军”在外，其实不只百万，而是170多万。其中上海、北京、杭州、武汉、南京、昆明等13个城市都有5万人以上，最多的是上海，有近20万人。这些外出的温州人不但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拓展了温州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开辟了就业门路，解决了全市约1/4人口的就业问题。

8. 就业观念的改变

温州人具有很强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机遇观念。温州人市场就业观念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就业与创业结合起来，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择业、自我创业、依靠市场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温州人认为，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或是搞个体同样都是就业，国企、民营本无区别，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因而，在温州“下岗静悄悄，不找市长找市场，不

叫下岗叫转岗，不叫失业叫创新业”。

这种择业观的形成，为温州的就业打开了广阔的天地，温州就很少出现其他一些城市存在的“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尴尬局面。温州也没有对民工和外地人进城就业实行人工限制，相反却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员就业。

三、温州的成功：经验总结与理论认识

(一) 民营经济发展是温州就业制度形成的物质基础

实际上，“八方呼应”就业机制已经包含了“温州模式”的主要内容。“温州模式”的最大特征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由于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展开，带来了第二、三产业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就业岗位的大量增加。所以，温州成功的就业经验主要是：经济高速增长是温州就业制度形成的物质基础；城镇化建设既形成了温州经济的扩张，也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就业的重要手段；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农民的分化和就业观念的转变使更多的温州人在就业时选择了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我们认为，在温州成功的就业经验中，最主要的还是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强社会的动态就业能力，解决就业压力问题。

温州经济二十多年来始终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主要就是依靠发展民营经济。

与许多老工业基地相反，温州在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相对薄弱，国有经济中就业人口比重本身就比较低，这使温州在经济体制和就业机制转换中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与之相对应的成本也低廉。所以，温州发展民营经济的路走得较快。还在2003年，温州民营经济占GDP比重位居浙江省第一位。

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温州赢得了经济扩张，也赢得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二) 从温州经验引发的理论思考

1. 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认识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的办法是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有两条途径，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低下，一定时期内靠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来达到经济总量的积聚是难以办到的。所以，应主要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正是外延式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现时我国的特殊国情，应注重以劳动力“替代”资本。

走经济外延式增长之路，最佳的途径莫过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但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据测算，每一单位固定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劳动密集型轻纺部门是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部门的2.5倍，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大企业的10倍以上^[2]。温州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功地解决了就业问题，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管道问题”（指就业机会的产生与取消之间的关联比例问题）有关。表面上看起来，“管道问题”是政府的政策导向问题，但实际上应是一个市场问题。既然，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在国情条件的限制下，民间力量自然会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国情条件的驱使。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巨大的国家来说，任何罔顾大量的劳动力剩余，任何不能尽量充分地吸纳剩余劳动力的现代化模式都是不合国情也注定会流于失败”^[3]。

2. 对几个就业观点的商榷

从温州成功解决就业问题的经验看，在解决我国就业问题上，几个有影响的（下转第65页）

剥夺通过子女生育上所享有的某种“特权”而得以补偿，从而实现代内不公的代际间补偿，这也可看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平^[9]。

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从现在起到 2010 年，中国推行城乡统一的生育政策。目前，农村生育政策比城市宽松，城乡政策由“二元分体”向城乡一体化迈进，并不是农村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农村生育政策逐渐向城市生育政策靠拢，而是城市生育政策适当放宽，城市生育政策向农村生育政策靠拢。同时，推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无条件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即变现在的“双独”为“单独”，从而实现家庭结构的重构。第二步，从 2010 年起，全国城乡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参考文献:

[1] 岩复, 陆光海.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微观”研究——湖北省天门市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点和原因调查 [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5).

[2] 欧广源, 雷于蓝. 广东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6. 496- 510.

[3] 乔晓春. 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1).

[4] 陈友华. 关于出生性别比的几个问题——以广东省为例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1).

[5] 顾宝昌, 罗伊.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和韩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比较分析 [J]. 人口研究, 1996, (5).

[6] 欧广源, 雷于蓝. 广东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6. 563- 567.

[7] 同 [4].

[8] 同 [4].

[9] 陈友华, 陆建新. 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J]. 人口与经济, 2003, (4).

[责任编辑 崔凤垣]

(上接第 54 页)

观点我们是不赞成的。

(1) 以现时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为标准来评价我国的产业结构，认为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失衡，强调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增加就业总量。

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类比，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以第二产业的发展为先导、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第二产业的相应发展，何来第三产业的发展？在第二产业的“准备”还不足的时候，第三产业能快速发展吗？

(2) 以“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吸纳的能力下降”，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下降为由，主张降低经济增长率，扩大就业。

上述情况在我国是存在的，但这更多的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是特殊的现象。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扩大就业的努力最终都将成为徒劳。

(3) 有的学者以内需不足而反对扩大第二产业，这是片面的。因为，¹ 我国的工业化才走了一半的路。^④内需不足主要是广大农村市场还不活。如果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则内需也会大幅增长。

参考文献:

[1] 温州市统计局. 温州市 200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6 年 3 月 27 日.

[2] 孙祖芳. 关于就业与失业问题的理论政策研究 [J]. 社会科学, 2004, (3).

[3] 柯荣住. 城市就业 (人口) 控制制度及其变革: 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 [J]. 经济科学, 1998, (4).

[责任编辑 崔凤垣]